

長春文史資料

●一九九〇年第四輯

●總第三十三輯

Y. 2. 1. 1. 2

《長春文史資料》編輯部 編

长春文史资料

目 录

1990

4

总第33期

曲折的道路 光辉的前途	李国泰 [1]
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张泽多 [9]
我的回忆	部长春 [16]
1956年1月18日前后	杨李侯 [25]
长春市资本主义工商业 社会主义改造的历程	长春市民主建国会 [36]
税务工作在对资本主义工商 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作用	长春市税务局 [50]
长春市对资本主义工商 业社会主义改造大事记	长春市民主建国会 [58]
记长春市文艺工作团	王兆一 [69]
改造妇女史话	魏丽晶 [82]
青火的烈火在这里点燃	宫怀濛 [93]
伪满时期的一所特殊学校	李大可 杨季清 [114]
回忆伪满新京工业大学	赵恩棠 [120]
故人与往事	郝幼权 [128]

露天音乐堂情况调查	韩玉洁〔152〕
东京薰风音乐会调查	韩玉洁 林成青〔157〕
新京红电字总会片断回忆	焦英棠〔160〕
孙立人其人	王振中〔164〕
我所知道的孙立人将军	张 奕〔169〕
我所知道的梁华盛	王振中〔174〕
张景惠等落网经过	郭 航〔187〕
日本侵华时期的七大特务机关	金永顺 编译〔190〕
读者·作者·编者	
关于朱格之死	朱友石〔238〕
读《黑衣宰相郑孝胥》补漏	罗继祖〔240〕

编者 的话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是我党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组成部分，它在引导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纳入社会主义轨道，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中起到了历史的积极作用。以下这组由长春市民主建国会编写的文稿反映了长春市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时期的概况，这些对于我们了解当时我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的改造道路和对于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可提供借鉴和参考。

曲折的道路 光辉的前途

李国泰

1948年10月长春解放，使我这个旧社会被人称之为“大少爷”的人开始了新的生活。当然，翻过这新的一页并非一挥而就、一帆风顺，而是经过曲折的历程，在彷徨踌躇后走向光明之路的。

长春解放初期，我对共产党是毫无认识。有一种“正统”观念，对共产党则有一种无名的恐惧，怕“共产”。直至看到人民政府发布了各项政策，特别是关于“公私兼顾，劳资两

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政策后，心情虽有所平静，但仍处于观望状态。1949年春，我接到一位老同学（地下党员）的来信，受到鼓舞。信中说：“人民政府是扶助发展工商业的，只要依法经营，是会有前途的。伯父善办实业，你应帮助伯父尽快恢复生产，支援国家建设。”并建议我学一学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和任弼时同志的《论经济政策》等书。我学了以后，受到很大教育，感到共产党并非像国民党所说的那样无知和鲁莽，更不是要“共产共妻”，也非“洪水猛兽”。真是为了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兴旺，人民幸福的。乃劝说和帮助我父亲筹备恢复“样田锯木厂”的生产。为了争取工厂早日复工，我各处奔走，直到拜见张文海副市长，得到他的批准恢复工业用电的许可，才使我厂很快恢复了生产。在我与张副市长以及工业局、工商管理局、电业局的局长、具体工作人员接触中，使我突出的感到共产党的“官”好见，平易近人，通情达理，既不唬人，又不卡人，没有官僚习气，什么事，说办就办，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使我在感情上对共产党有了一些了解。

工厂恢复后，我在工厂任工场长管车间生产。当时，由于企业负责人和我父亲（经理）对党的政策仍有怀疑，不愿出头露面，由我代表经理、企业负责人出外办事，参加各种会议，结识了一些工商业者。当时，好多工商业者都对共产党不“托底”怀有戒心，所以，好多事不朝前。由于我当时年轻（25岁）好胜，“初生牛犊不怕虎”，倒愿意出来“练达练达”。

1949年春，我被选为长春市工商界公债劝购委员会的秘书长。

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全体工商业者的努力超额完成了分配给工商界37万分的任务（实际交款额41万分），受到党和政府的称赞。其后，在积极工作中，我被推选为制材业评税委员会主任，组织评税活动，积极宣传党的税收政策，并且带头认定

税负分数，使我们同业公会评税工作很快结束。全市评税结束后，我应长春市税务局长张超亲自邀请在全市纳税动员大会上代表工商业者讲话，响应政府号召，开展纳税竞赛，提出了税票下发后，立即交款的行动口号。会后，在各行业主、副委、常委会上呼吁各行各业做好准备。结果，税票下发后，全市业者以3小时36分的时间完成了交款，取得全国各城市纳税交款时间最短的好成绩。市税务局受到总局的表彰。当然，这一成绩的取得主要是市委、市政府、市税务局组织推动的结果。是全市工商业者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积极行动的结果，自己只是做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工作而已。

1949年9月，我被选为长春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以后继续担任着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一届政府委员、二届人大常委会委员、市政协常委、副秘书长等职务。从1949年起直到我被调到省民建工作，一直参与着市政方针、政策的协商制定，亲历长春市的发展变化，深知长春是怎样从一片废墟中重建起来的，是怎样从枯萎贫弱走向繁荣昌盛的。抚今追昔，实在令人赞叹！解放前，长春市人口不到17万，工商业不过210家，又多为咖啡馆、酒吧间，银楼、拍卖行之类。而今，长春市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经过重建家园，发展生产，克服困难，励精图治，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每念及此，怎不令人欢欣鼓舞啊！

1950年，美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侵朝战争。在这场战争之初，由于我对美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认识不清，有恐美崇美思想，加之，看到当时我们的武器装备太差，也有“以卵击石”之感，心里嘀咕，“这场战争打赢打不赢？”，“共产党长了长不了？”，“买卖能不能干下去？”当时，在工商业中有所谓“红旗飘五星不定，扭秧歌进退两难”的感叹。直至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在朝鲜战场上浴血奋战，取得抗美援朝的胜利，我和许多人才真从心眼里相信共产党的伟大。这期间我市工商业者在爱

国主义、国际主义旗帜感召下，团结在党的周围，同全国人民一道，响应抗美援朝总会的号召，支援抗美援朝战争。一方面，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积累财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另一方面，捐献飞机大炮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抗击美帝国主义。1951年初，长春市抗美援朝分会成立，我被选为委员。随后，成立了工商界支会，我被选为秘书长，投入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斗争。组织了工商界抗美援朝示威大游行，显示了工商业者爱国热情，受到市委书记刘亚雄、副书记吴铁鸣等党政领导同志的赞扬。随后，我又和工商界上层人士一起在党的领导下组织工商业者捐献飞机大炮的活动。推动长春市工商业者完成了捐献战斗机5架的任务。同时在我倡议下，在胡占波（主委）陈国兴（常委）等人的支持下，提出动员工商业厂长、经理用本人工资再捐献一架“经理、厂长号”战斗机的号召，得到普遍响应，如期完成了交款任务。受到长春市各界人民的好评。随着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教育的深入，使我看穿了美帝纸老虎的真面目。在思想上得到了一定的改造，在政治思想上开始靠拢到党和人民的一边来了。

1951年底和1952年初，党和国家先后开展了“三反”、“五反”的斗争，清除隐藏在国家机关和国营企业内部资产阶级代理人，粉碎资产阶级以“五毒”行为破坏国家建设，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促其老老实实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这场斗争，为国家实行计划经济创造了条件。在“三反”运动开始时，因为是揭露党、政干部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我在人民代表会议上发言表示拥护。认为党做得对，不如此，难以保证干部廉洁奉公；不如此，也会像国民党一样成为贪官污吏。随着运动的深入，揭露出资产阶级的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资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非法行为，使自己感到震惊，但又感到“与己无关”。直到运动深入，经过党的教育，自我反省，群众揭发，我坦白了祥田锯木厂的偷税、漏

税、偷工减料等行为，结案时祥田锯木厂被定为“半违法半守法”户。“五反”运动后，我曾一度对党产生很大怀疑，心想“共产党言行不一，说实事求是，根本没有实事求是”。后来，党对工商业者坦白交待的不实之处，予以清除，又几次减免退财补税额，继续扶持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发展，心情又平静下来，积极接受加工、订货，努力发展生产。

“五反”运动暴露了私营企业经营的盲目性及其唯利是图的本质，暴露了与国家政策和与国营经济之间的矛盾，因而“五反”后，许多企业生产任务不足，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为了扭转这种局面，政府则通过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等形式将私营工商业逐步纳入低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尽管如此，由于我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兴建了一批现代化国营企业，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优越性进一步发挥出来。而设备陈旧，经营管理落后，人浮于事的资本主义企业更加暴露出它的弱点。加之“五反”后，人民群众对私营企业产生了极大的不信任，因而私营企业日见萧条，有的甚至无法生存下去了。

1952年，党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指出，“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1953年，国家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社会主义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各种经济成分比重发生显著变化。实行低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显然国家能够控制它的发展方向，但在加工费和货价上，公私双方的争论往往是很激烈的。私营企业有时甚至不愿接受或不认真履行合同，或由于其生产落后，达不到质量要求，而受到罚款。这样资本家也就无利可得，促使许多私营企业，意欲卸掉包袱，而要求公私合营，成为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长春市的公私合营，是从1954年开始的。开始国家先把规

模较大的私营工厂逐步纳入公私合营。企业公私合营后，国家投资进行扩建、改建，派干部参加管理，生产迅速发展，产值、利润成倍增长，生产力大大提高，为解决供求矛盾创造了条件。这类公私合营企业中的私股由于企业发展也得到相当的利润。因为单独合营时的利润分配是执行“四马分肥”的政策，即：所得税34.5%，福利费15%，公积金20%，资方红利20.5%。这样，资本家不仅从困境中解脱出来，而且又得到了利润，是十分高兴的。

1954年冬，党委推荐我到市工商联任宣教科副科长，与工商业者接触的时间更多了。通过接触，我了解到，当时大多数工商业者是处在“身背负债（欠“五反”退财补税欠款，工人工资等），设备陈旧，人浮于事，门可罗雀”的局面，都希望早日摆脱困境，羡慕已公私合营了的企业。但又怕失去企业，失去“三权”（资产所有权、人事任免权、经营管理权）。处在所谓“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矛盾心态。

1955年冬，毛主席接见出席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会委员时，向全国工商业者提出了“要认清形势，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的教导。他说：“资本家应该认清社会发展规律，应该掌握自己的命运。资本家只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有前途，只有把自己的命运同国家的命运结合起来，才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凡是现在对工商业的改造有贡献的，社会和国家都不会忘记他们的贡献。”毛主席的话犹如春风雨露，不胫而走，犹如指路明灯，照亮了工商业者的前途。使工商业者进一步提高了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认识，提高了对形势、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高了爱国主义、社会主义觉悟。一些工商界中的骨干分子听了传达毛主席的讲话之后，“当仁不让”，纷纷提出公私合营的申请。争取早日走上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公私合营。但由于1955年底，尚未合营的私营企业家数虽多，规模太小，国家不便同

他们一个一个的合营起来。而资本家又心急如焚的争取合营。这在当时形成了一股潮流。特别是随着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出现,大大影响、推动了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于是孕育了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的到来。1956年1月15日,首都北京敲响了庆祝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锣鼓,1月18日长春市也召开了庆祝全行业公私合营大会。这一天,长春市到处红旗招展,锣鼓喧天,载歌载舞鞭炮齐鸣,欢快而热烈的场面,使人至今记忆犹新。在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变革中,我自始至终参加了这一运动,深感无尚光荣和幸福。这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史上的伟大创举,是马克思、列宁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实行赎买政策的伟大实践。在我国不经流血,不闻枪声,和平地完成了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历史任务,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又谱写了新篇章。

全行业公私合营后,经过清产核资、清债定股,又确定给予私股以五厘定息(年息5%)。对私方人员采取“量才录用,适当照顾”的方针,给予安排,使之在生活上,工作上都有了保障。我自己在党的照顾下,被安排到市民建任宣教处处长。

总结工商业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当年,全国工商联主任委员陈叔通说:“听说改造不自然;大势所趋不得不然,接受改造自然而然。”这是符合实际的。长春市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之后,我们在展望美好前景的时候,又把陈叔通的总结加上了一句话,叫作“实现社会主义乐陶然”。应该说,工商业者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是有个从不自觉到半自觉到比较自觉的过程的。对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也是从怀疑到半信半疑,到比较相信的过程的。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也是与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在党的教育下,不断学习新知识,不断接受新事物,不断取得新进步,在这场变革中起了“有益的配合作用”分不开的。企业改造和人的改造是相互影响互为

因果的。思想认识提高了，促进企业改造；所有制发生了变化，又为人的改造创造了条件。这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变革的辩证关系。如今在我国资本家阶级早已不再存在了，这个阶级中有劳动能力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劳动者。所以，我以为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不仅在于消灭私有制，而更重要的是改造了人。以我自己为例，我之所以能够从一个“大少爷”成为一名国家干部、省级民主党派负责人，就是因为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的结果。如果不是在党的培养教育下走社会主义道路，很难预想我人生的旅途。因此，我说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到中国革命实践中的辉煌成就；中国把企业改造同人的改造结合起来，同样是一大贡献。

1990年5月2日

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张泽多——

我原是一个民族工商业者，从新中国建立开始，就参加了同业公会和工商联的一些工作，经历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全过程。我在人与企业的双重改造中，深深地体会到了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政策的伟大。现仅将我的经历和感受，草录片段，以资纪念。

企业的兴衰

我经营的企业建立于1937年。开始时是一手工操作的小型酱油作坊，字号叫“长春酱园”。这个酱园实际是一个家眷铺，是老婆、孩子参加劳动发展起来的。伪满时期在日伪统治下，生产原料靠配给，产品靠分配，稍有不慎就要被以经济犯论处，我的企业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苟延残喘。国民党时期仍然没有改变这种命运，照样困难重重。最后竟然连自家的生活都难以维持，何谈经营企业，终于在1947年被迫停业。

1948年长春解放，在党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下，我的企业才得以恢复生产。在党的政策扶植下，长春酱园如鱼得水，不仅起死回生，而且蒸蒸日上。

记得解放当时，长春并没有国营酱园，主要是靠私营酱园供应市民生活需要。而一些大的酱园的资本家多已逃跑，这就

为我的酱园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会。我经营的酱园由于政策的扶持和个人的积极经营，很快地就有了较大的发展，从一个过去提不到名分的小酱园，发展成为一个好不错的酱园。无论生产能力，还是市场供应，或纳税，捐献等方面都是同行业中的一二等户了。记得1949年工商业登记，我的资金只有东北流通券5 000万元，佣工5人；1953年重新登记时资金是7 296万元，佣工8人。1954年与大华酱园并厂时定股人民币8 000元，到1956年公私合营时定股人民币1万元。可以说，我的企业自解放以后是“步步登高”。这是党和政府保护和扶持私营工商业发展的结果，我常回顾长春酱园解放前后的兴衰史，以激励自己跟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

思想的变化

我的童年家境很贫寒，从小饱尝了亡国奴的滋味，心灵深处蕴藏着反帝爱国的思想。1945年祖国光复时我是何等欢欣鼓舞，满以为重见天日，可以在经营企业上求得发展以报效祖国。遂于1946年与自家兄弟集资在二道河子信和街新建厂房，增添设备，扩大生产。谁想好景不长，只一年就被迫停业。那时我目睹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败、酒醉烟花，抓兵抢粮的无法无天的罪行，心中只有惊慌和哀叹！长春被困时，由于不明真相，我对逃亡地主等诬蔑共产党的反动宣传也曾有过疑虑和不安。1948年解放军兵临城下，我逐渐听到一些关于：“共产党要解放全中国”、“共产党保护扶持和发展私营工商业”、“共产党不斗争资本家”等消息，心情也逐渐安定下来，并且盼望早日解放长春。

1948年10月长春解放了，全市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的人民得到了拯救。很快地政府就召开了工商业者大会，号召工商业者马上开门营业。会上正式宣布免税3个月，对有困难的企业还发放贷款。特别是那醒目的标语“发展生产、繁荣经济、

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真是令人兴奋极了，那时我虽然不懂革命理论，但我从心底对共产党产生了崇敬之情。从此，我经常情不自禁地唱起：“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1949年我开始与税务工作的同志打起了交道，被他们的清正廉洁、大公无私的革命作风所感动。有一次看到一位税务工作同志拿着饭盒坐在板凳上吃饭，那种朴素作风，使我联想起旧社会税务人员那种专事敲诈勒索、贪污受贿的形象，从而对旧社会的恨、对新社会的爱更加强烈。同时也更加激发了我协助政府搞好税务工作的热情，我不仅带头纳税，而且在评税时秉公外理，对税收工作做了少许贡献。后来我被选为同业公会主委，由于经常参加市工商联的活动，又先后被选为市工商联常委，副主委，使我有为党为国家更好地工作的机会。是党为我开拓了新的人生之路和光明前途。我自担任工商联领导工作后，有了参加党、政部门召开的会议和出席省、全国工商联会议的机会。从而更加扩大了眼界，丰富了知识提高了觉悟，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思想也更增强了。最使我难忘的是1951年有幸去北京参加建国两周年国庆观礼。这是我一生永远不能忘怀的最光荣、最幸福的一件大事。最激动人心的是9月30日那天晚上，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怀仁堂举行盛大的招待会。参加招待会的有全国各条战线的先进模范和解放军、志愿军战斗英雄及外国来宾。上千人的大宴会厅里，灯火辉煌、乐曲悠扬，充满了一片喜气洋洋的气氛。宴会前，毛主席作了长篇讲话，当他举杯祝酒时全厅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当我看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宋庆龄等给劳模和战斗英雄敬酒时，真是感慨万千，我做梦也没想到象我这样一个渺小的工商业者竟能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将一同参加国庆观礼。10月1日，秋高气爽、日暖风和，在天安门的观礼台上举目四望，红旗招展，彩旗飘扬，欢乐的人海响彻着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声音。9点整，朱总司令在礼炮声中检阅了人民解放军

陆、海、空三军。接着，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团结起来，艰苦奋斗，为争取抗美援朝伟大胜利而斗争”的号召。看到这雄伟壮观的场面，我激动不已。国庆观礼之后，我们在北京连续参观了几夭，同时又参加了工业部、商业部、中国人民银行、民建总会邀请的座谈会，使我进一步了解了全国的政治和经济形势以及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这次观礼是一次极为深刻的政治学习，是对我人生观改造的一次重大促进。我就是在参加这次观礼时被民建总会直接吸收为民建会员的。当时我虽然对民建了解的不多，但从章程中看到：民建是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民主党派，它的成员主要是工商界进步人士。从这点上，我就觉得参加民建是向党更靠近了一步。因此，从北京回来以后，我更加振奋，积极靠近党委，经常向市委统战部汇报请示工作。后来因“五反”运动等原因民建没有发展组织。1953年市委派一名党员同志协助我发展民建会员，最早参加民建的有苗竹贤、辛德贵、李国泰等人。春季，成立了民建小组，我任组长，并以民建小组名义在工商界开展了一些工作。6月成立民建筹委会，苗竹贤为主委、我和高竹峰任副主委^①。民建从筹委会至正式成立期间正是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重要时期，民建在协助党和政府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对成员思想改造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许多民建会员由于得到组织教育，在公私合营试点和全行业公私合营时起了积极地带头作用。我在民建工作中只做了一点微不足道的贡献，但从中得到了很大的锻炼和提高。

由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形势的需要，民主建国会决定在全省主要城市发展组织，因当时无省级组织，民

^① 1956年5月6日召开了中国民主建国会长春市第一次会员大会。会议选出委员15名，组成第一届委员会，选举苗竹贤为主任委员，高竹峰、张泽多、程镇国为副主任委员，邵长春为秘书长，沙中典为副秘书长。

建中央授权长春市民建负责。吉林、四平、辽源、通化、公主岭等市民建组织都是在当地党委领导下由长春市民建负责帮助于1956年先后建立起来的。

夙愿的实现

1953年，我们国家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并提出了“一化三改”的总路线。这时国家已有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经济基础，国营、合作社经济大发展，私营经济比重显著下降，尤其是经过“五反”“三反”运动的深刻教育，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的政治觉悟也有很大提高，这些都为实现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良好条件。1954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提出，为实现国家的总路线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需要改造私营工商业，发展国家资本主义，进一步明确地提出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方向。就在这一年长春市开始了国家资本主义高级形式的公私合营的试点工作，实现了益发合、新力棉纺厂的公私合营，为扩大公私合营提供了经验。同时，也推动和鼓舞了全市工商业者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决心。我决定以实际行动争取早日实现自己企业的公私合营，便开始了积极的准备工作。当时，我的厂只具备合营条件之中的两条，即“自愿”和“需要”，但距“可能”还有距离，主要是规模小、设备落后。为了创造合营条件，我们厂于1954年秋与大华协商合并。并厂后工厂易名大华酱园。我之所以积极准备和申请公私合营，当时主要出于三点想法：一是，因为我是工商联副主委，应该带头走社会主义道路；二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大势所趋，是工商业者的光明前途；三是，认为早日合营企业可以保平安。

1955年7月大华酱园成为长春市第三个公私合营的企业，我的夙愿终于实现了。我这样一个中小型企业是长春市第三家合营的企业，我深感无尚光荣和万分高兴。合营后我破例被

任命为经理，公方为副经理。在与公方的合作共事上，我曾有过“一切由他负责”自己“无事一身轻”的想法，后来看到，公方副经理十分尊重我，使我有职有权，特别是在厂貌发生显著变化的教育下，我深受感动，怀着虚心向公方学习的心情，主动与他配合工作，我们相处得很好。1956年我调到公司工作，与他一别再未见面，我现在已老矣，回忆起来对他仍有怀念之情。

在我的企业合营之后，到1955年秋，长春市就有益发合、新力棉纺厂、大华酱园、广泰恒、车太号油坊、华康食品工业、原成制车厂等7个厂先后实现公私合营。它为迎接全行业公私合营奠定了基础。

1955年10月毛主席接见在北京出席全国工商联执委会的全体同志，并做了重要讲话。毛主席谆谆教导我们要认识社会发展规律，认清国家和个人前途的关系，要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一讲话极大地鼓舞了工商业者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已到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时候。全国工商界很快地掀起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商潮。在全国形势的推动下，长春市工商业者也纷纷要求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市工商联及时地将这一情况向中共长春市委做了汇报，并代表工商业者向市委和政府提出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申请。1956年1月我们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市委、市政府接受并批准了我们的申请。

1月18日，春城阳光灿烂，到处洋溢著欢乐的气氛。庆祝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伟大胜利的游行队伍象一条长龙，人们手举彩旗，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向省市委、省市政府涌去，欢乐的气氛达到了顶点。就在这一天市委举行了庆祝宴招待工商联委员，副市长李承钰同志向我们祝酒时的音容笑貌，至今仍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回忆往昔，感慨万千。从我经营的企业来说，在国家经济恢复时期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做出了微薄的贡献；在社会主